

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思路

——兼论中国特色数量经济学探索历程与东财贡献

王维国^{1, 2}, 张同斌^{1, 2}, 付裕¹

(1. 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5;

2. 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计量分析与预测研究中心, 辽宁 大连 116025)

摘要: 计量经济学经过中国本土化发展演变为数量经济学, 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范式变革。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构建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基础性、战略性意义。本文从全球视角追溯计量经济学学科发展脉络, 系统梳理党的十八大以前中国特色数量经济学的探索历程, 分析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基础、构建原则和构建路径, 重点剖析东北财经大学在数量经济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方法创新和实践应用等方面的贡献, 全面展现中国数量经济学学科从引进吸收到自主创新的发展历程。研究表明, 构建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坚持“两个结合”、立足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实践、融通中外的必然选择。东北财经大学作为国内数量经济学学科的研究重镇, 以完整的学科体系、均衡的师资结构、丰硕的创新成果和广泛的实践应用, 为构建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学理支撑与实践范例。

关键词: 数量经济学学科; 自主知识体系; 东北财经大学

中图分类号: F064.1;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176X(2026)05-0019-13

数量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分支之一, 它以经济理论为指导, 综合利用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技术, 通过构建和应用经济数学模型对经济数量关系及其演变规律进行定量分析、理论检验、趋势预测与决策支持。中国数量经济学必须立足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实践, 构建既接轨国际学术规范、又能深刻阐释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自主知识体系。本文系统梳理中国特色数量经济学的探索历程, 反思现实挑战, 明确未来发展路径。构建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时代使命。

一、计量经济学学科发展简史

中国数量经济学的兴起深受西方计量经济学发展影响, 经济理论演进、数理统计方法革新和

收稿日期: 2026-04-07

作者简介: 王维国 (1963-), 男, 吉林通榆人,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经济计量分析、宏观经济分析、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E-mail: wwguodufe@163.com

张同斌 (1985-), 男, 山东潍坊人,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经济计量分析、经济周期波动分析与预测研究。E-mail: tongbinzhang@126.com

付裕 (1994-), 女, 黑龙江哈尔滨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经济计量分析与人口经济学研究。E-mail: fydufe@163.com

数据基础完善共同推动计量经济学学科走向成熟。整体来看,计量经济学学科发展可划分为萌芽、确立、拓展和转型四个阶段,各阶段紧扣时代命题形成标志性成果,推动学科方法体系持续深化。

(一) 学科萌芽:经济数量分析的思想溯源

20世纪20年代以前,计量经济学经历了从古典政治算术到近代数理统计的漫长演进,逐渐确立了利用数学和统计工具分析经济现象的方法论基础。这一阶段呈现数量化思想初步渗透的核心特征,为后续学科建制化发展奠定了思想根基。实际上,“用数据说话”的思想基础最早可追溯至17世纪,配第在《政治算术》一书中系统提出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研究经济学问题的方法^[1]。18世纪,魁奈在《经济表》中利用简明的图表模拟了社会总产品的循环流动过程,这已具备早期宏观经济系统模型分析的雏形。步入19世纪,经济学数学化的深入推进和统计方法的系统创立为计量经济学的诞生提供了双重支撑。在经济学数学化方面,1874年,瓦尔拉斯创新性地利用联立方程模型来系统描述经济系统中各类商品的供求均衡状态,并提出经典的一般均衡理论;1890年,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将边际分析方法与数学符号系统引入供给与需求分析,用严谨的函数形式表达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统计方法方面,1829年,高斯证明最小二乘法的优化效果强于其他方法,此后该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经济数量分析;1886年,高尔顿在研究人类身高遗传规律时发现“回归到平均值”现象,并于1889年系统创立回归分析方法;1895年,皮尔逊在高尔顿提出“相关”(Correlation)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积差相关系数的精确计算公式,为测度经济变量的相关性提供了方法基础。20世纪初,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加速融合。1914年,摩尔对多年的农产品产量与价格数据进行回归拟合,这是经济学史上最早利用统计方法估计供需曲线的经典尝试之一。1926年,弗里希仿照“生物计量学”,提出“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概念,不仅明确了学科的核心内涵,更为计量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与方法基础。

(二) 学科确立:范式奠基与体系初创

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催生了对经济规律量化研究的迫切需求,计量经济学正式成为独立学科,并完成核心范式构建。1930年,在弗里希、费雪和丁伯根等学者的倡议下,世界计量经济学会在美国成立。该学会旨在推动经济理论的定量分析与统计实证的有机结合。1933年,世界计量经济学会创办会刊*Econometrica*,标志着计量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正式诞生^[2]。弗里希在创刊词中强调“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三者结合才构成计量经济学”^[3],这一界定成为学科经典定义。在学科初创期,计量经济学在宏观经济模型和方法论方面呈现集中突破之势。1936年,丁伯根构建了第一个完整的荷兰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后又受国际联盟委托,对美国等多个国家的经济周期波动进行计量统计分析,以期合理揭示各国历史上的经济波动规律,并对经济发展趋势进行预测。1944年,哈维默将概率论引入计量经济学,并强调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核心任务是通过概率模型对经济现象进行推断,而非仅仅拟合历史数据,这为经济模型的随机性假设提供了数理统计基础,使计量经济学从早期的“描述性”分析上升为“推断性”科学。同时,哈维默不仅确立“理论模型设定—统计模型构建—参数估计—假设检验—预测分析”的研究范式^[4],还针对联立方程模型形式提出“结构式”“简化式”概念,为处理经济系统中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的关系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框架。

(三) 学科拓展:方法创新与应用深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经济步入复苏阶段。这一时期,计量经济学从理论研究迈向实践应用,不仅逐步分化出宏观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微观计量经济学等分支,应用领域也从最初的经济预测和政策评估,进一步延伸至企业决策、金融风险管理等更广泛的场景,计量经济学由此成为推动经济学走向“科学化”的核心方法支撑。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克

莱因为代表的计量经济学家先后构建了多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例如, 1955年, 克莱因和戈德伯格提出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 该模型将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就业等关键宏观变量纳入统一分析框架; 1958年, 克莱因加入宾州大学沃顿学院后, 致力于创建沃顿模型, 该模型可用于预测国民生产总值、出口、投资、消费等经济指标的波动, 也可用于分析税收、政府支出、石油价格等因素对经济的影响。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大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估计均面临变量内生性、数据非平稳等问题。基于此, 泰尔于1953年提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于1962年和泽尔纳提出三阶段最小二乘法, 两种方法均用于解决联立方程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 1964年, 萨根提出误差修正模型的初步思想, 该模型将短期动态调整与长期均衡关系纳入统一分析框架, 用于解决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

在此之后, 计量经济学在时间序列分析、面板数据方法和微观计量等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时间序列分析方面, 1970年, 博克斯和詹金斯提出完整的时间序列建模方法论, 构建了自回归积分滑动平均 (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ARIMA) 模型; 1974年, 格兰杰和纽博尔德揭示了“伪回归”现象的存在, 动摇了经典计量经济学关于数据平稳性的基本假定; 1979年, 迪基和富勒提出了用于检验时间序列是否平稳的单位根检验方法; 1982年, 恩格尔利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 ARCH) 模型刻画金融波动集聚性, 并于1987年和格兰杰提出协整理论及其检验方法。在面板数据方法方面,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 蒙德拉克、霍克和纳洛夫等学者融合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优势, 共同推动了面板数据方法体系的建立, 形成了涵盖动态面板模型、空间面板模型、非参数/半参数面板模型和非线性面板模型等的方法论体系^[4]。在微观计量方面, 1979年, 赫克曼针对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提出了赫克曼两阶段方法, 该方法有效纠正了因样本非随机选择带来的估计偏误。与此同时, 麦克法登系统发展了离散选择模型, 该模型广泛应用于消费者行为、劳动力供给和交通需求等领域。

(四) 学科转型: 因果革命与前沿融合

20世纪90年代, 因果推断逐渐成为计量经济学的核心议题, 其主要难点在于经济事件与经济政策的内生性问题, 以及反事实的不可观测性^[5]。考虑到传统计量分析方法 (如普通最小二乘法) 在随机对照试验时难以有效识别因果效应, 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和断点回归设计等多种准实验方法应运而生。1994年, 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围绕自然实验与局部平均处理效应开展了系统性研究, 清晰阐述了如何通过工具变量识别具有明确因果解释的处理效应。安格里斯特和皮施克合著的《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 实证研究指南》《精通计量: 因果之道》, 以清晰的因果推断导向和“让数据说话”的实证哲学, 深刻影响了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1994年, 卡德和克鲁克将双重差分法引入劳动力市场分析, 推动了因果推断在劳动经济学研究中的系统性应用。

进入大数据时代, 数据规模、维度和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 传统计量分析方法在处理高维数据、捕捉复杂非线性关系时面临挑战, 而机器学习方法能够在保持因果推断严谨性的同时实现灵活建模^[6-7], 贝叶斯计量经济学、动态因果模型等方法也进一步丰富了计量分析的方法体系。大数据分析、空间计量分析和社会网络等方法的融合, 使得计量经济学研究对象从传统经济数据延伸到非结构化数据、时空数据等^[8-9]。基于机器学习方法在预测精度上的优势与结构模型在经济学解释上的强项, “机器学习+结构估计”逐渐兴起, 即先利用机器学习方法捕捉复杂非线性关系, 再嵌入结构模型进行经济现象解释。

二、中国特色数量经济学的探索历程

中国数量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始终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学术思想解放同频共振, 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引进吸收到本土探索, 再到自主创新的渐进式发展。这一时期, 中国经济学界在学习借鉴西方计量经济学学科发展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独特实践, 探索

契合中国国情的数量分析路径,为今后具有中国特色的数量经济学学科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培养了专业人才队伍、夯实了学科发展基础。

(一) 发轫起步: 计划经济背景下的数量分析初探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中国经济学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核心任务是服务于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与综合平衡,数量分析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或研究方法体系。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逐步推进,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运行的量化调控需求日益凸显,学者开始尝试利用数学和统计学方法分析国民经济运行的数量规律。1960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国民经济平衡组内设立经济数学方法小组,以孙冶方、于光远、马洪、乌家培、张守一等为代表的学者率先开展相关研究,重点聚焦投入产出法、经济数学模型的应用^[10],探索社会主义再生产的数量规律。

20世纪60—70年代,受当时政治环境与学术条件的限制,经济数量分析研究受到较大冲击,仅有少数学者坚守学术阵地,坚持开展基础理论与方法探索。1979年,学术思想逐步解放,乌家培、张守一等学者发起成立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会(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前身),来自全国各地的18位代表就建设数量经济学、成立数量经济研究会发表看法,并就“经济学要重视数量和方法的研究”等6个核心议题展开深入讨论^[11]。值得一提的是,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定下“数量经济学”(Quantitative Economics)这一学科名称^[12],为学科后续发展明确了方向,也为系统引进西方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并开展本土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 系统引进: 改革开放初期的前沿吸收与学科普及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加快,国民经济实现快速增长。面对日益复杂的宏观调控需求,传统的分析方法已显不足,迫切需要引入更先进的量化分析工具。由此,中国经济学界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学习借鉴西方计量经济学的前沿成果,通过举办讲习班、翻译引进教材、推动学科建设等多种方式,快速普及了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培养了首批计量经济学学科骨干,并搭建了研究平台。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著名计量经济学家克莱因(于同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联合邹至庄、刘遵义、萧政等国际知名计量经济学家,在北京颐和园举办“经济计量学讲习班”(即“颐和园讲习班”),系统讲授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与应用。这个有着“黄埔一期”称号的讲习班,被学界视为中国计量经济学发展的标志性起点,不仅为中国培养了首批计量经济学学科骨干,更推动了西方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系统传播,打破了当时国内学术研究较为封闭的局面,让中国学者全面接触西方计量经济学的前沿成果。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技术经济研究所;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将技术经济研究所与经济研究所数量经济研究室、工业经济研究所管理现代化研究室合并,组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创办《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期刊,并召开第二届中国数量经济学会(会上正式更名)年会^[13],这些均为学科发展提供了研究平台。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东北财经大学(下文简称“东财”)等高校率先设立计量经济学相关专业,开展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教学。在教材建设方面,主要侧重于引进并翻译国外经典著作,如古扎拉蒂的《计量经济学》《经济计量学精要》、格林的《计量经济分析》。1981年,东财许开甲翻译了科苏扬尼斯的《经济计量学理论》,该书是国内较早引进的系统性计量经济学理论教材之一。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开始编写本土化教材。1992年,李子奈编著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与应用》出版,该书是结合中国应用实际的计量经济学教材,其在推动计量经济学教学规范化的同时,也为后续教材的本土化探索提供了重要范式。

(三) 本土探索: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自主创新雏形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经济转型进入关键阶段。

数量经济研究强调对经济体制、结构、技术引进等问题的定量分析,同时要避免“重方法、技术轻理论、关系”的问题^[14]。此时,西方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已难以完全适配中国经济的独特特征,计量经济学研究逐步从引进吸收转向本土创新,在学科体系、方法创新和问题研究等方面逐步形成自主探索的格局。学科体系逐步规范化、制度化,方法创新逐步聚焦中国问题,研究成果服务于中国经济实践,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方向与学术风格。1998年,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将“计量经济学”列为高等学校经济学门类专业核心课程,计量经济学教学在全国高校逐渐普及,加快推动了高校数量经济学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建设,完善了研究生培养体系,优化了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的设置^[15]。与此同时,学术组织与研究平台的建设进一步完善,中国数量经济学会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性学术组织,定期举办年会、学术论坛等活动,推动了学科交流与合作。《经济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期刊刊发大量计量经济学相关论文,为研究成果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平台^[16]。

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的本土化尝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国内学者针对中国宏观经济数据非平稳、样本量小、制度变量复杂、区域差异显著等特点,聚焦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现实问题,开展了一系列本土化方法的探索。中国数量经济学的自主研究逐步形成了三个核心方向。一是宏观经济计量与政策分析。学者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聚焦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失业等重大宏观经济问题,量化分析有效需求不足的形成原因和经济影响^[17],模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等^[18]。二是微观经济计量与转型分析。学者利用微观计量分析方法,探讨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中产生的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问题^[19],以及解释人口结构转型背景下家庭养老模式的变化等^[20]。三是理论计量方法创新。针对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特点,学者聚焦模型设定优化、估计方法改进^[21]和检验功效提升^[22]等方面进行研究,推动了计量经济学方法与中国实践的深度融合^[23]。

三、构建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思路

2012年以前,中国数量经济学历经数十年的探索实践,基本完成了学科体系从无到有的初步搭建,在引进吸收国际前沿方法、适配中国经济转型实践、培养专业队伍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为中国特色数量经济学的早期探索作出了应有贡献。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探索也存在理论原创性不足、学科交叉融合不够深入、国际影响力有限等问题。进入新时代,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数量经济学学科实现从引进吸收向自主创新的跨越,这对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数量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至关重要。

(一) 构建基础:新时代的理论实践支撑与人才培养

构建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立足前期探索积累、依托新时代实践探索、借鉴国际前沿成果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两个结合”、立足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实践、融通中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动中国数量经济学学科发展。

在理论基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明确了中国数量经济学学科自主发展的方向,既要立足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实践,又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合理成分,避免简单照搬西方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的新发展理念、新质生产力、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等标识性概念,为中国数量经济学研究确立了核心范畴,并

构建了分析框架,推动数量经济学研究从“单纯的数量分析”向“数量分析与价值引领相结合”转变,彰显了中国数量经济学学科的中国特色与价值导向。

在实践基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成就,以及稳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坚实步伐,为全球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典型样本^[24],也产生了许多西方计量经济学难以解释的经济现象,包括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发力^[25]、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26]、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推进^[27]等。这些独特的实践场景既为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源头活水,也对计量分析方法的本土化创新提出了迫切要求。

在学科基础方面,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数量经济学学科建立起完整的“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团队与专业人才,建成了多个核心研究平台。与此同时,西方计量经济学领域的因果革命、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发展等,不断催生出新的学术前沿和研究方向。国内学者在区间数据模型分析^[28]、异质性处理效应评估^[29]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方法创新,并积极将这些前沿计量分析方法应用于具体实践。经过一段时间的持续探索,中国数量经济学学科具备了从“跟跑”向“并跑”乃至“领跑”转变的条件,这为构建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有力的学科支撑。

(二) 构建原则:立足本土、融通中外、服务实践

基于新时代以来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积累,构建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坚持立足本土、融通中外、服务实践,在自主知识体系的科学性、实践性和创新性上作出更多探索。

第一,坚持立足本土的自主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因此,构建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在深刻把握“六个必须坚持”内涵要义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融入计量经济学的模型设定、变量选择和机制分析中,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逻辑和历史必然性,使数量经济研究始终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第二,坚持融通中外的开放性。自主不等于封闭,创新不等于否定借鉴。构建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应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学习借鉴西方计量经济学的前沿成果,如因因果推断、机器学习、空间计量、贝叶斯计量等先进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此外,要加强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将中国数量经济学学科的原创新性成果推向世界;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学术规则的制定,打破西方计量经济学的话语垄断,提升中国数量经济学学科的国际影响力。

第三,坚持服务实践的主体性。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24]。脱离中国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既缺乏现实意义,也难以形成独特优势。构建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始终坚持以中国实践为导向,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如人口新变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绿色低碳转型的方式、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等^[30]。要从中国实践中提炼研究问题、构建分析模型、创新研究方法,避免简单套用西方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模型解释中国现象,避免为了创新而创新、为了理论而理论的脱离实践倾向,构建契合中国国情的数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体系。

(三) 构建路径:三维协同,加快构建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聚焦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立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个维度协同发力、整体推进,实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教学创新与应用创新的有机统一,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数量经济学学科的贡献。

第一,完善学科体系,筑牢自主发展的制度根基。构建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完善中国数量经济学学科框架。一是明确学科定位,优化学科结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中国实践与经济数据特征,覆盖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微观计量经济学、大数据(高维)计量经济学、金融计量经济学、宏观计量经济学等领域,创新本土化计量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提升数量经济学学科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并推动其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环境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展学科发展边界。二是规范教材与课程体系,编写兼具本土特色与科学性的教材,融入中国经济案例数据与实践经验,弱化对西方教材的依赖。在课程设置上,增加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实践环节,引导学生最大限度地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预测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培养兼具理论功底、方法论素养与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31]。

第二,创新学术体系,突破自主创新的主要瓶颈。构建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推动计量经济学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一是扎根中国实践,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数量经济学研究的标识性概念。例如,新质生产力测度、数智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等。二是推动计量分析方法的本土化创新,针对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运行模式、顶层设计、数据变化特征等,创新适配性的计量分析方法。例如,推动大语言模型与计量分析方法融合,优化空间计量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创新收入分配与差距测度的计量分析方法,有助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通过以问题研究推动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的方式,提升计量分析方法对中国实践的适配性,实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研究闭环。

第三,构建话语体系,提升自主知识的国际影响力。构建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亟须提升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数量分析话语权。一是构建中国话语表达体系,用国际学界易懂的学术语言,阐释中国数量经济分析方法,避免“自说自话”。同时,将新发展理念、新质生产力、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等标识性概念,纳入可量化、可检验的学术范畴,形成国际认可的分析框架,推动中国数量分析话语与国际计量分析话语的对接。二是加强与国际顶尖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邀请国际优秀学者参与中国数量经济学研究,鼓励中国学者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创新性研究成果,推动中国数量经济学走向世界。三是推动成果转化应用,将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国家政策制定、社会治理和企业决策等领域,以实践成效验证理论价值与方法优势,提升中国数量经济学学科的国际影响力,让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与成就。

四、探索中国特色数量经济学和构建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东财贡献

东财是中国数量经济学研究重镇。自20世纪80年代起,依托学校数十年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学科底蕴与学术传统,东财数量经济学学科始终与中国数量经济学学科发展历程同频共振。经过四十多年发展,东财数量经济学学科形成了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计量经济理论与应用、数理金融与实证金融、经济系统优化方法与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分析等研究方向,并在吕洪范、刘兴权、董文泉、王庆石、王维国、夏少刚、郭多祚、高铁梅、赵进文、陈磊、王雪标、佟孟华等学者的推动下,奠定了东财数量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制度与组织基础,推动了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创新,更强化了成果应用、提升了学术影响力,为探索中国特色数量经济学和构建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东财范本。

(一) 学科拓荒:筑牢中国特色数量经济学发展根基

20世纪80年代,东财率先开展计量经济学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成为国内财经类高校中最早开拓数量经济学学科领域的院校之一^[32],为探索中国特色数量经济学筑牢初期根基。在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的影响下,1984年,东财在经济信息系设立数量经济研究所,这是国内最早专门从事数量经济学研究的机构之一,其成立拉开了东财数量经济学系统化研究的序幕。1987年,东财数量经济研究所独立建制,首任所长吕洪范是中国最早从事经济控制论研究的专家之

一, 全程参与数量经济学位点建设; 第二任所长刘兴权先后参加了1994年和1997年举办的世界经济计量学会远东会议, 并作主题发言。1999年, 东财将数量经济研究所、经济信息系经济数学教研室和数学基础教学部整合为数量经济系, 王庆石为首任系主任; 2002年, 王维国主持数量经济系工作。

在学位点建设方面, 东财长期秉持“人才兴学科”的理念, 逐步构建起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有力推动了国内高层次数量经济学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与完善。1985年, 东财在工业经济专业下招收首批数量经济学硕士生; 1986年, 获批全国首批数量经济学硕士点; 1998年, 获批全国首批数量经济学博士点; 2000年, 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获准设立博士后流动站, 至此, 东财形成了完整的“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人才培养体系。在教育教学方面, 东财系统开设计量经济学相关课程, 打破了国内高校“重定性、轻定量”的教学格局。20世纪80年代中期, 东财为经济学专业学生开设“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经济预测与决策”等课程。与此同时, 东财重点引进了一批兼具数学、统计学与经济学功底的学者, 逐步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实力雄厚的研究团队。1996年, 东财引进中国数量经济知名学者、博士生导师董文泉; 2002年, 引进中国数量经济知名学者、博士生导师高铁梅, 极大地推动了东财数量经济学学科高水平学术队伍的发展。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完善了中国数量经济学的学科架构, 更推动了学科规范化发展, 为今后具有中国特色的数量经济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二) 标志成果: 形成东财数量经济学学科优势

进入21世纪, 东财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方法创新和实践应用等方面持续发力, 聚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 推动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适配, 形成了具有东财特色的研究方向与学术风格。

在学科建设方面, 2002年, 东财数量经济学学科获批辽宁省重点学科; 2003年, 东财数量经济学学科被列入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建设学科; 2006年, 数量经济系更名为数学与数量经济学院, 同年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东北分中心在东财成立; 2007年, 东财数量经济学学科获批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2009年, 东财经济计量分析与预测研究中心获批辽宁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与此同时, 针对国内早期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若干突出问题, 2001年, 王维国和何向华率先开发了“计量经济学”课程课件, 该课程于2007年被教育部评定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王维国等提出“计量经济学QMT教学模式”, 该成果获得2005年辽宁省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 东财经济计量分析类课程教学团队于2008年、2009年先后获得省级、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称号。这些均凸显了东财在计量经济学教学领域的特色与积淀。

在人才培养方面, 依托首批数量经济学硕士点、博士点建设优势, 东财坚持“以研促教、教研相长”的理念, 注重培养学生的量化分析能力和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 引导学生关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实际问题而避免简单机械的理论灌输, 在经济预测、投入产出分析等研究领域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33-34], 也形成了结构合理、潜力突出的学术梯队。其中, 博士研究生梁云芳的博士学位论文《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房地产增长周期的波动——特征、成因和结构变化的计量分析》被评为2009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仅获评两篇), 这是辽宁省省属高校人文社科类专业博士毕业生首次获此殊荣, 高铁梅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 王维国指导的2009届硕士毕业生王霞,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特聘教授, 2026年, 受邀担任*Journal of Econometrics*的副主编。

在方法创新和实践应用方面, 东财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 为中国数量经济学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核心支撑。在方法创新方面, 王维国等^[35]为了对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多个突变点进行判断, 引入了基于贝叶斯推断的多个突变点判断理论, 并将其应用于中国GDP序列检验; 王维国等^[36]考虑含有结构突变和截面相关的面板协整检验, 拓展贝叶斯信息准

则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BIC) 并应用于二氧化碳和经济增长长期关系的研究。在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景气状况分析方面, 高铁梅有效弥补了西方计量经济学理论对“转型经济体”经济特征刻画的不足, 其主导开发的宏观经济监测预警系统被国家信息中心推广至各省市, 极大提升了数量经济学学科的社会服务能力和行业影响力; 高铁梅主编的教材《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 EViews 应用及实例》, 自 2007 年出版以来, 累计发行 8 万余册, 成为数量经济学专业年轻学者的必备教材。陈磊^[37] 基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司委托课题“中国人民银行工业企业景气问卷调查实证分析”, 系统构建了企业景气指数, 证实了企业景气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联, 以及不同行业的景气变动时差特征。在数理金融方面, 王庆石、赵进文、王雪标、佟孟华等学者聚焦结构突变检验方法、DCC-MGARCH 模型和修正的 ECM-BGARCH (1, 1) 模型等, 在资产定价、风险管理、金融市场波动、金融条件指数构建、宏观政策分析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 推动了计量分析方法的本土化应用^[38-41]。此外, 陈飞等^[42]、杜修立和王维国^[43]、张同斌和高铁梅^[44] 分别聚焦“三农”问题、出口贸易、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定量分析。

(三) 系统贡献: 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东财实践

2015 年, 东财统筹学科资源, 将数量经济学学科整合至经济学院, 进一步优化学科资源配置, 推动数量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学科的交叉融合。目前, 东财数量经济学学科已建成规模合理、结构优化、基础扎实、年龄梯次与知识结构配置均衡的师资团队。其中, 张同斌、陈飞、范丹等中青年学者快速成长, 已成为博士生导师和学术带头人。步入新时代, 东财数量经济学学科仍以理论方法强化引领方向、以实践应用回应现实所需、以交叉融合拓展学科边界, 在理论计量方法创新、实践应用研究、人才输出、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等方面不断深耕, 为构建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东财力量。

在理论计量方法创新方面, 团队重点围绕数据混频、空间溢出、高维且非线性等特征, 拓展传统计量模型及估计方法。一是打破传统时间序列模型的局限, 推导中度爆炸性 AR (1) 模型在反持久误差下最小二乘估计量的极限分布, 完善金融泡沫识别计量工具^[45]; 基于混频数据回归分析技术, 提出经济增长速度和波动强度双重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周期混频测度, 以适配多频率宏观数据特征^[46]。二是针对短面板、非平稳面板模型, 创新非线性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二阶解析似然修正方法, 有效缓解了短面板估计偏误^[47]; 建立可以处理经济变量非线性和非对称的面板单位根检验, 验证了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存在性^[48]; 将结构突变引入截面相关下的半参数趋势面板模型, 提出有效估计量和识别程序^[49]。三是聚焦空间自回归 (Spatial Autoregressive, SAR) 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构建无需工具变量的半参数 Copula 框架, 采用带未知自由度的 Student's *t* Copula 捕捉尾部依赖, 提出基于 Sieve 的最大似然估计方法, 以实现多参数联合估计^[50]; 基于时变内生空间权重矩阵设定, 构造 SAR 模型的广义工具变量估计量, 提升模型适用性与估计精度^[51]。四是面向经济金融高维数据特征, 创新构建高维平稳高斯 Copula VAR 模型, 基于秩估计与自协方差矩阵实现转换矩阵估计, 开发格兰杰因果去偏推断, 适配厚尾、非线性与非负数据场景, 为宏观金融高维数据建模提供新方案^[52]。

在实践应用研究方面, 团队围绕宏观经济预测、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减贫与反贫困举措、产业创新发展和经济绿色转型等问题进行定量分析。针对传统计量模型预测的偏差问题, 构建适配中国小样本、异质频率数据的混频回归模型, 实现了季度 GDP 的短期预报^[53]。聚焦人口老龄化问题, 构建包含生育率和预期寿命两个关键变量的世代交叠模型, 揭示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54], 以及构建包含初育年龄的离散全生命周期模型, 研究了意愿生育水平与初育年龄之间的 U 型关系^[55], 这为人口政策优化提供了判断依据。针对实现脱贫攻坚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论证了非农就业与教育回报对打破贫困家庭增收瓶颈的关键作用^[56], 揭示了土地流转改善农村收入分配结构的内在逻辑^[57]。在产业研究方面, 借助深度学习技术构建企业创

新质量指标,揭示了供应链的双向创新溢出效应^[58]。同时,还系统评估了留抵退税改革对企业产业链融通的驱动效应,为优化产业政策提供了事实依据^[59]。随着中国绿色转型不断深入,绿色金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数字金融试点政策^[60]和排污许可证政策^[61]为切入点,为中国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提供了实证参考。此外,还分别从数字经济发展^[62]和碳信息披露^[63]等视角系统分析了碳减排的作用机制,为“双碳”战略与生态治理的协同推进提供了理论支撑。

在人才输出方面,截至2025年末,东财数量经济学学科累计培养硕士毕业生1300余名、博士毕业生近150名。毕业生广泛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天津财经大学、山西财经大学等高校,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在培养期间,研究生积极参与“‘十二五’时期宏观经济运行动态监测分析研究”“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监测和预测研究”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省际能源消费的变系数非参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基于大数据计量方法的中国人口政策评估与优化研究”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研究,参与撰写并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Economics Letters*、*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等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科研成果获得第九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获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辽宁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数十篇,为理论计量方法创新和解决重大现实经济问题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持,成为推动中国数量经济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方面,东财持续升级现有平台,打造了一批国家级、省级研究平台,为创新研究提供了坚实支撑。作为东财数量经济学学科带头人,王维国秉持“厚基础、重方法、强应用”的理念,带领经济计量分析类课程教学团队入选国家级教学团队,其主持的“经济系统虚拟仿真实验”入选国家和辽宁省一流本科课程,负责的“中级计量经济学”获批辽宁省课程思政示范项目。立足“做强中国数量、服务国家战略”的理念,东财打造国际化学术标杆平台,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格兰杰、赫克曼等国际知名学者为“亚洲计量经济学与统计学暑期学校”(下文简称“亚洲暑期学校”)授课;2011年起,东财已连续主办“经济计量分析与预测国际学术会议”14届、“IAER 计量经济学国际研讨会”(前身为“东北计量经济学国际研讨会”)9届。此外,团队还承办了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与中国经济学家高端论坛、2019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年会、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年会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盛会,并推动与厦门大学等高校及中国科学院等科研院所合作,联合主办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亚洲暑期学校、全国数量经济学博士生学术论坛等活动,为国内外年轻学者提供追踪现代数量经济学术前沿、拓宽国际学术视野和提升创新研究能力的机会,为中国数量经济学学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作为教育部经济学“101计划”《计量经济学》课程建设参与高校,东财数量经济学学科团队参与教材编写和虚拟教研室建设,为推进课程体系优化、教学资源共享和师资协同培养作出重要贡献。东财依托自身平台建设,积极推动中国数量经济学共同体的学术积累与知识传播,为国内数量经济学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长期以来,东财在数量经济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方法创新和实践应用等方面持续深耕,产出一批兼具学术价值与应用前景的研究成果。然而,在中国式现代化加快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东财数量经济学学科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未来,东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继续扎根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弘扬东财数量经济学学科的学术传统。东财将着力推动“数量经济学×数据要素”“数量经济学+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并在现有学术品牌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持续产出创新性研究成果,助力构建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世界计量经济学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 [1] 罗经先. 经济计量学的形成和发展[J]. 财经科学, 1983(3): 78-84.
- [2] 雷鸣. 计量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J]. 理论与现代化, 1998(3): 29-30.
- [3] 李子奈, 齐良书. 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思考[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2): 69-83+221-222.
- [4] HSIAO C. Analysis of panel dat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63+251+339.
- [5] 洪永森, 方颖, 陈海强, 等. 计量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若干新近发展及展望[J]. 中国经济问题, 2016(2): 126-136.
- [6] 洪永森. 理解现代计量经济学[J]. 计量经济学报, 2021, 1(2): 266-284.
- [7] 陈强. 计量经济学中的因果推断: 过去、现在与未来[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65(1): 43-64.
- [8] 汪寿阳, 洪永森, 霍红, 等. 大数据时代下计量经济学若干重要发展方向[J]. 中国科学基金, 2019, 33(4): 386-393.
- [9] 李龙飞, 虞吉海. 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基于空间计量的文献综述[J]. 经济管理学报, 2024, 3(1): 83-114.
- [10] 齐建国. 数量经济学发展概述[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1997(10): 76-82.
- [11] 纪京. 建设数量经济学 成立数量经济研究会[J]. 经济学动态, 1979(8): 14-16+5.
- [12] 乌家培. 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 2008, 18(1): 1-4+8.
- [13] 张守一, 王宏昌. 纪念中国数量经济学会成立 20 周年[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1999(3): 61-63.
- [14] 乌家培, 欧阳进. 加强理论研究进一步发展数量经济学[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1996(1): 3-6.
- [15] 李子奈. 计量经济学高级课程的设置与内容体系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 2002(5): 9-13.
- [16] 成九雁, 秦建华. 计量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轨迹——对《经济研究》1979—2004 年刊载论文的统计分析[J]. 经济研究, 2005, 40(4): 116-122.
- [17] 汪同三, 李涛. 中国通货紧缩的深层次原因[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6): 42-53+205.
- [18] 《国家财政模型》课题组, 高铁梅, 赵振全, 等. 我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及政策模拟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00(8): 114-120.
- [19] 颜敏, 王维国. 教育错配对工资的惩罚效应——来自中国微观面板数据的证据[J]. 财经研究, 2018, 44(3): 84-96.
- [20] 张川川, 陈斌开. “社会养老”能否替代“家庭养老”? ——来自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J]. 经济研究, 2014, 49(11): 102-115.
- [21] 叶阿忠, 吴相波, 黄志刚. 半参数计量经济联合模型的变窗宽估计理论[J]. 管理科学学报, 2009, 12(2): 60-66.
- [22] 林光平, 龙志和, 吴梅. Bootstrap 方法在空间经济计量模型检验中的应用[J]. 经济科学, 2007(4): 84-93.
- [23] 洪永森. 计量经济学的地位、作用和局限[J]. 经济研究, 2007, 42(5): 139-153.
- [24] 高培勇, 樊丽明, 洪银兴, 等.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J]. 管理世界, 2022, 38(6): 1-56.
- [25] 林毅夫. 中国经验: 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缺一不可[J]. 行政管理改革, 2017(10): 12-14.
- [26] 洪银兴, 任保平.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内涵和途径[J]. 中国工业经济, 2023(2): 5-16.
- [27] 方锦程, 刘颖, 高昊宇, 等. 公共数据开放能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来自政府数据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J]. 管理世界, 2023, 39(9): 124-142.
- [28] SUN Y, HAN A, HONG Y, et al. Threshold autoregressive models for interval-valued time series data[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18, 206(9): 414-446.
- [29] 张征宇, 孙广亚, 杨超, 等. 异质性政策效应分析——一种新的因变量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及应用[J]. 经济研究, 2021, 56(6): 177-190.
- [30] 王珺, 张建刚. 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挑战及战略选择[J]. 理论视野, 2023(2): 55-61.
- [31] 石荣. 新型本科院校计量经济学理论、实践和案例三位一体课程教学模式探析[J]. 大学教育, 2019(5): 141-143.
- [32] 王庆石. 数量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及专业发展问题研究[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03(3): 79-81.
- [33] 梁云芳, 高铁梅, 贺书平. 房地产市场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06(3): 74-84+

- 205-206.
- [34] 张同斌,高铁梅.高技术产业产出增长与关联效应的国际比较——基于美、英、日、中、印、巴六国投入产出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3,12(3):847-868.
- [35] 王维国,王霞,颜敏.时间序列多个突变点的贝叶斯推断——对我国GDP序列的实证分析[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0,40(9):45-53.
- [36] 王维国,薛景,于刚.基于结构突变和截面相关的面板协整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3,30(5):75-89.
- [37] 陈磊.企业景气状况与宏观经济运行[J].管理世界,2004,20(3):14-24.
- [38] 王庆石,彭宜钟.什么定价模型能够更好地刻画我国A股股价的时间序列特征?——无条件泰勒定价模型及其在我国A股市场中的检验[J].经济学(季刊),2008(1):359-382.
- [39] 赵进文,黄彦.中国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关系的模型实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6(2):45-54+205-206.
- [40] 王雪标,周维利,范庆珍.我国原油价格与外国原油价格的波动溢出效应——基于DCC-MGARCH模型分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2012,31(4):571-584.
- [41] 佟孟华.沪深300股指期货动态套期保值比率模型估计及比较——基于修正的ECM-BGARCH(1,1)模型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28(4):137-149.
- [42] 陈飞,范庆泉,高铁梅.农业政策、粮食产量与粮食生产调整能力[J].经济研究,2010,45(11):101-114+140.
- [43] 杜修立,王维国.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及其变迁:1980—2003[J].经济研究,2007,42(7):137-151.
- [44] 张同斌,高铁梅.财税政策激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J].经济研究,2012,47(5):58-70.
- [45] LUI Y L, XIAO W, YU J. Mildly explosive autoregression with anti-persistent errors [J].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21, 83(2):518-539.
- [46] 陈磊,孟勇刚,王艺枫.双重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周期混频测度[J].统计研究,2018,35(9):29-39.
- [47] DHAENE G, SUN Y. Second-order corrected likelihood for nonlinear panel models with fixed effects [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21, 220(2):227-252.
- [48] 王维国,杜重华,薛景.基于逻辑函数平滑转移模型和截面相关的非线性面板单位根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36(1):133-151.
- [49] 王维国,殷亮.半参数趋势阈值面板模型及其参数估计[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31(9):124-137+160.
- [50] LIN Y, SONG Y, AMEMIYA T, et al. Addressing endogeneity issues in a 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 using copulas [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25, 252(PA):106106.
- [51] 王维国,吴传开,付裕.空间权重矩阵设定及SAR模型的广义工具变量估计量[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4,44(9):3023-3042.
- [52] FAN Y, HAN F, PARK H. Estimation and inference in a high-dimensional semiparametric Gaussian copula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23, 237(1):105513.
- [53] 王维国,于扬.基于混频回归类模型对中国季度GDP的预报方法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33(4):108-125.
- [54] 王维国,刘丰,胡春龙.生育政策、人口年龄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9,54(1):116-131.
- [55] 王维国,付裕,刘丰.生育政策、生育意愿与初育年龄[J].经济研究,2022,57(9):116-136.
- [56] 陈飞,卢建词.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14,49(2):101-114.
- [57] 陈飞,翟伟娟.农户行为视角下农地流转诱因及其福利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15,50(10):163-177.
- [58] 张同斌,刘文龙,王蕾.高质量创新的溢出效应:企业供应链的视角[J].经济研究,2024,59(11):38-54.
- [59] 张同斌,刘文龙.留抵退税改革、融资约束与企业产业链关联[J].管理世界,2024,40(3):94-115.
- [60] 李慧,佟孟华,张国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碳减排效应——基于空间溢出效应与城市异质性的视角[J].统计研究,2024,41(9):44-58.
- [61] 俞中,佟孟华,赵江山.排污许可监管、绿色金融创新与企业信贷融资[J].世界经济,2025,48(5):89-127.
- [62] 费威,于宝鑫,王维国.数字经济发展与碳减排——理论推演与实证检验[J].经济学家,2022(11):74-83.
- [63] 范丹,杨中园,凡盼来.委托代理视角下碳信息披露的减排效应:理论机理与经验证据[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4,44(7):2194-2212.

Thoughts on Building a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Quantitative Economics: Exploratory Journey of Quantitative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WANG Weiguo^{1, 2}, ZHANG Tongbin^{1, 2}, FU Yu¹

(1. School of Economic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2. Center of Econometric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Summary: Econometrics, through a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in China, has evolved into quantitative economics, greatly advancing an economic research paradigm that integrate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China. Based on tracing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etrics and incorporating the defining features and practices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exploratory journey of quantitative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proposes an approach to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quantitative economics in China. In terms of its foundation, guided by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deepen the “Two Combinations” and to continually advanc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s grounded in China's practice, thereb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quantitative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garding the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it is essential to adhere to the autonomy rooted in local conditions, ensuring that quantitative economic research remains firmly embedded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 is essential to uphold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while bridging China and the world, absorbing cutting-edge achievement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etrics with an open and receptive attitude; and it is essential to maintain a practical orientation focused on serving real-world needs, targeting major practical issues emerging in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As for construction pathways, the focus should be on the two main pillars—distinctive concepts and original theories—and efforts should be coordinated across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to build a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quantitative economics.

As a major hub for quantitative economics research in China,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UFE) has provided significant support and a practical model for building a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quantitative economics. First, during the initial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DUFE pioneer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quantitative economics discipline,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through degree program establishment and pedagogical advancements. Second, by addressing practical issues arising from economic systemic transformation, the DUFE promoted the localized adaptation of econometrics theories and methods, thereby shaping distinctive research orientations and an academic style. Third, in the new era, the DUFE's quantitative economics discipline has continued to guide the field through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refinement, respond to practical demands through applied research, and expand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via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Key words: quantitative economics disciplin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责任编辑: 尚培培)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6.05.002

[引用格式]王维国,张同斌,付裕. 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思路——兼论中国特色数量经济学探索历程与东财贡献[J]. 财经问题研究,2026(5):19-31.